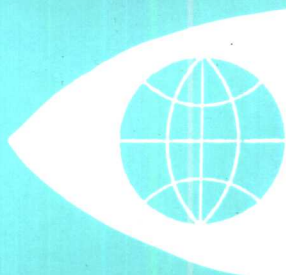


【美】 田 浩 著

姜长苏 译

功利主义儒家 ——陈亮对朱熹的挑战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南宋时期，中国文明正面临严重危机，而正是对社会与政治问题的忧患，在当时的儒者间引发了“道德伦理”与“事功伦理”之争。“明道谊而计功利”，遂成为冲出程朱框架的新口号，显示出儒学发展的新倾向。在“责任伦理”的原则已成为共识的今天，重新回顾这段思想脉络，或可为儒家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回应，寻找到传统的哲学资源。

【美】田 浩 著

姜长苏 译

本书责任编辑委 刘 东

功利主义儒家 —— 陈亮对朱熹的挑战

江苏人民出版社

书 名 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
作 者 [美]田 浩
译 者 姜长苏
责任编辑 余江涛 蒋卫国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125 插页 2
印 数 1—6140 册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1997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974-4/G·574
定 价 10.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迫切需要理论上的借鉴与创造。为此,我社在优先出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关于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著作的同时,也适当选择一些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的较有影响的著作出版。海外学者占有的丰富资料,他们的研究视角和某些方法,对我们认识中国的国情,评估中国文化的传统、心态及其前景,从而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的建设,都有着启迪和借鉴意义。当然,他们的著作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甚至同我们存

在着某些原则分歧,这是需要读者加以认真审察和辨识的。同时,任何借鉴都代替不了自己的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要靠我们自己的中国当代的实践中去概括和总结。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丛书只求为此提供某种有益的参照和比较。如果这套丛书能在这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将感到欣慰。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列强的船坚炮利迫使中国人逐步地改变关于世界秩序的古老观念，却远远没有改变他们反观自身的传统格调。50年代以来，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的中国研究却有了丰富的成果，以致使我们今天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需要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不仅要向国内读者译介海外的西学，也要系统地输入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可能会加深我们100年来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它的学术水准也再次提醒：我们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将被中华文明所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高度发达的、必将对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也正因为这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这古老的中国警句便仍然适用，我们可以借别人的眼光来加深自知之明。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从几代学人的成果中撷取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或见解时，我们自然不能从各家学说中只挑选那些我们乐于接受的东西。如果那样做，这“筛子”本身就使读者失去了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但这次译介毕竟只是初步的尝试，成败利钝，欢迎论评。

丛书编委会 1988 年

中文版序

中国宋代思想的主要转变吸引了我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注意。这一转变的结果一直对中国产生着影响，所以今天的中国人仍在讨论着宋代遗产的正负两面。在20世纪，一些学者指出宋代儒者对中国的教育与哲学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中国许多的政治、社会领袖却指责他们强化了社会中的封建特质和习俗。

本书中的两位历史人物在今天关于宋代儒学遗产的讨论中经常是问题的中心。朱熹(1130—1200)提出了一套综合的思想体系，使中国的伦理价值得以重整与加强。除了宋代经济与社会变迁对传统价值所造成的影响之外，由于1127年金人入侵导致的中原领土丧失，民众对儒学价值的自信遭到削弱。在回应华北沦落的问题中，陈亮(1143—1194)提出一些设想，以寻求赵宋王朝之中兴大业；而且，他得出结论说，当同时代人花费较多时间思考文化价值与形而上学时，便不再注意解放华北所需之制度与军事准备。陈亮努力使国家重新统一，在此之间，他发展出功利主义伦理学以及历史相对主义的价值观。陈亮关于结果的观点向朱熹所认为的中国的经典价值是永恒绝对的思想发出了挑战。二者皆汲取各种不同的思想资源以努力解决当日

之问题,但他们主要还是运用儒家术语并在陈述观点时与孔子的教义保持一致。他们来往信函中的争论是特别生动的中国不同思想倾向之间的对照,其中所讨论的问题使争论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当然,特别是与 20 世纪 70 年代相比,今天中国人对陈亮与朱熹论辩的态度已有不同。在 70 年代中期,当我在哈佛大学为做博士论文而第一次研究陈朱之辩时,许多的中国学者正在称赞法家陈亮是一位进步的思想家,他反对反动的儒家朱熹。在 90 年代,中国许多的思想、政治领袖如今已修正了他们对朱熹与儒家的看法。在今日中国,一些人像他们在 70 年代偏于陈亮那样倾向朱熹一边。重要的是,在 1974 年,人们搜集了陈亮的著述,并为现代读者出版一个新的标点本。今天,朱熹文集的新版本不久也将问世。

我虽然并未声称具有客观性,但是我的确拥有一个外部的有利地位,以此来观察中国过去与现在的各种论辩。距离确实限制了我的能力,无法看清楚某些细节,但它却能使我把握住较大画面及主要倾向的方方面面。作为一名思想史家,我首先努力在性格与宋代问题的语境下理解陈朱之辩。当然,西方目前的一些历史理论强调不可能“如其原貌”地理解过去。尽管我意识到认识过去是多么困难,但我依然认为,这样刻苦努力地去做是历史学家的起点。要想更好地把握两人对当时问题的思考,应当加深我们对中国思想历史发展的理解;而且,我们也不再经常、尖锐地对这些历史问题作意识形态的解释。在任何一种情形下,阅读我对进行着的关于文化价值及社会—政治问题之解决方案的争论的观察也许对今日中国不无裨益。

借助这本译著的出版,我得以与更多的中国读者分享我的思考。一些中国学者在读完我的英文著述或中文论文后有所论评,对订正我的理解并鼓励我努力研讨中国思想史很有帮助。或许这本译著能使更多的中国读者对我的书进行评判,从而增进我对中国

文化史的知识。

尽管我仍然坚持英文版中的看法,但还有两点须加以订正,以回应自拙著1982年首次面世以来中国学界的新认识。首先,《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的出版时间已确信比1212年稍晚。在70年代我有幸成为若干世纪以来阅读这部南宋珍本的第一人时,我便接受了其序言中所标明的日子。为了确定该文献是真正的宋本,我请王德毅教授检视藏于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内的原稿;而且,我还请哈佛的杨联陞、洪业二位教授检查根据该馆对原书拍摄的缩微胶片冲洗出的照片。三位专家皆认为这一文献出自南宋。后来,因为北京大学邓广铭教授的第一部著作也是关于陈亮的研究,所以我让邓先生看了该书的缩微胶片。有了这部南宋文献,邓教授得以校正并扩充那以前的现代标准本,并且在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陈亮集》增订本。邓教授在新版开篇写了两篇文章对这个南宋本加以说明,并解释它如何不同于后来的版本。他虽然赞成该文献的真实性,也同意它出于南宋,但仍然提出一些理由来怀疑那篇序言和它标明的1212年的日期;另外,他建议说,该版本印行于1223年叶适死后,可能接近13世纪中叶。我接受邓教授对这一问题的判断;然而,我并未让译者姜长苏先生通观全书加以纠正。既然我们不能知道该本的确切日期,简略地称之为“1212年本”以区别于后来直至1987年中华书局版的所有版本皆凭依的1616年本,这是一种便利的做法。

第二,关于1178年妓院一事导致被控犯上有一个疑问。陈亮与此事有关吗?陈亮的涉入见于南宋史料叶绍翁之《四朝闻见录》(卷1,24—25页);而且,还重见于《宋史·陈亮传》,并在后来为现代编撰之《年谱》所沿用。但是在一篇讨论陈亮狱事的文章中,邓广铭教授非常令人信服地指出,陈亮自己著作中的内证使我们得出1178年一事是被讹传为陈亮故事的结论。见邓教授所著《陈龙川狱事考》,该文收入《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1994),546—

555 页。

邓教授对此问题的纠正被采入我最近的《朱熹的思维世界》(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6)一书中,该书还收进了自本书出版后所研究的另外问题。例如,后来我探讨了保存在南宋版本中陈亮在科举和大学中的试卷。更为重要的是,1996年讨论朱熹的书中包括了关于道学群体及其在南宋演进的更多研究。虽然陈亮亦属研究之列,但较多的注意力集中于另外人物,如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在诸多方面,1996年的著作拓展了在1982年书中首次探讨的画面与背景。

在此,我想简短地对另外一些问题加以说明。自从1987年中华版面世以来,我就开始参照这一版本。然而,在这部译著中,姜先生和我决定在注释中直接使用南宋1212年本,一如1982年书中之旧。这里,对各个版本中皆有之材料,依照《四部备要》和1974年的中华本。注释中的一些材料,如参考西方研究中的另外信息,对颇有研究的中国读者来说并不必要。在写作本书时,我引入这些信息以帮助西方的读者。也许,一些中国读者会有兴致从这些注释中观察到一位西方汉学家是如何为西方读者写作的。与1982年原书中将中国传统的“岁”转换为西方式的年龄不同,这个中文版重新将西方式年龄换回传统的“岁”。在译文的某些地方,我有所增删,努力使中国读者弄清我的意思。

我恳切地向《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主编刘东博士惠允将本书收入该套丛书表达我的谢忱。被收入这套大型丛书是一种荣誉。在几年前刘博士第一次致信我商讨出版1982年一书的中文译本时,我打算在当时正在此地读研究生的一位朋友的帮助下完成译文。但另外的事情使我不能专意译事,不得不向刘博士坦陈我的失败。幸运的是,刘博士并未失去耐心,仍对该书保持极大热情。刘博士还找到了一位优秀的年轻译者、被北大授予哲学硕士的姜长苏先生。我非常感谢刘博士和姜先生二位的工作和他们具有的专业知

识。在阅读并建设性地修订姜先生的译稿时，我得到了现住在亚利桑那的好友俞宗宪先生的很多有价值的帮助。另一位友人郑雷波先生在上月的旅行中帮我将译稿从北京带到了亚利桑那。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为本书中文译本的出版提供了部分资助，在此我要向 Ronald Barr, Associate Dean of the Office for Research; Milton Sommerfeld, Associate Dean of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 Sciences; Retha Warnicke, Chair of the History Department 诸位表示感谢。

校读译文再次提醒我向许多人表达我的谢意，他们包括在原书谢辞中提及的师友和家人。我对所有这些人，尤其是我的老师和家人的感激之情与日俱增。邓广铭教授是我的一位老师和朋友，直到原书写成之后我才有机会与他共享对陈亮的看法。他是陈亮及其它许多问题研究中最为博学的宋史专家，所以在他向刘博士极力推荐翻译并收入丛书中出版这本论述陈亮的书时，我特别高兴。朋友们不久将要庆祝邓教授 90 寿辰暨从教 60 年。在审阅该书译稿时，我的儿子田亮也秉承了我的思想。最近他从大学的中国历史专业毕业，目前正在申请进入研究生院。这些个人关系，糅合着友谊与学术，使我想到中国历史研究是一个活生生的、行进中的、一个能使人走入并愉快地继续下去的过程。在英文本中，我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宓联卿女士，并作为对其父宓锡宠先生的纪念。在本序的结尾，我再次将该书献给他们。

田浩 1996 年 11 月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序

当代研究中国思想的西方人似乎有两个愿望。一方面,他们希望能使中国思想为西方的听众所理解;另一方面,他们又力求在当时的与历史发展的两个维度上展现中国思想的广阔领域及内在复杂性,最重要的是要说明这种思想的历史演变性与疑难性。

在此期间,他们默默地反对着那种便捷的文化人类学取向,该取向声称要向我们描绘出固定不变的“中国心灵”的本质结构。当然,认为存在着打开中国文化之门的金钥匙的论点仍旧具有极大的诱惑,即使对那些不认为有什么打开西方文明之路的金钥匙的学者来说也是如此。即使我们同意那种“文化学者”的说法,认为中国文化中存在着某些主导性的、持久的根本倾向,中国思想史家也很容易指出这种根本倾向依然无法排斥多样性、内在紧张、思想冲突以及与时俱变的性质。而且,中国思想史家所产生兴趣的也并不仅仅是那种静止的中国思想,用约瑟夫·列文森的说法,思想家关心的是去考察中国人在其生存与历史境遇下的思维过程。

努力使中国思想可以为西方人所理解当然会遇到一些困难,其中包括不但是语言的,而且是文化范畴上

的“可通译性”问题。我们应该经常思考那些语言和文化相对主义者提出的疑问以及奎因一类哲学家讨论的“可通译性”的哲学问题。为了思想可以被理解,我们必须避免不经思考便权宜轻率地运用未受检验的中等范围的西方观念,如“唯物主义”、“民族主义”、“历史主义”、“理性主义”等。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武断地认定这些即便在西方背景下也具有复杂语义史的观念绝对不适合于中国思想。我们在处理中国思想时,可能会发现对有些问题作些调整就容易翻译成西方语言。另外的问题或许看起来仍然是“中国人所特有的”,通常远离西方人,特别是现代西方人的关切点。而在中国背景中,这两类问题却可能紧密相联;甚至对于那些“远离”的问题,研习中国思想的学者也一直希望它们还是可以介绍给西方读者的。

我以为,田浩所著的《功利主义儒家》一书对使中国思想为人理解有大的贡献,而且特别有助于向我们展示中国思想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历史性。在这部著作中,他选择了12世纪中国儒家思想的某些关键问题,这些问题包含在两位对手——朱熹与陈亮之间所发生的论辩之中,而它们正巧是极易通译的。功利伦理——“结果”伦理——与动机伦理的对立易于被研习西方道德理论的每一个人所认识。伦理价值与规范和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易于理解,尤其对那些学习19、20世纪西方历史思想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但确切地讲,中西方所运用的习惯用语是不同的。中国问题中的伦理是儒家的——而不是边沁或康德式的,讨论的整个背景也与西方背景根本不同。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事实:相同的问题可以产生于完全不同的文化与历史背景中,提出了比较思想中开拓思路的挑战。认为中国的功利主义伦理取向能与儒家伦理相联,而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个人主义无关,这会给我们讨论功利主义自身的问题开启新的视角。

而且,田浩教授不仅对具体问题作了检讨,还为我们提供了从

中产生这些问题的历史背景的广阔画面。在我看来，田浩这部著作是我所见及的以西方语言叙述宋代儒学思想多种特征的最生动、最易为人理解的作品之一。或许有的学者与他的诠释或术语使用有所不同，但无疑他已经设法将生动的活力注入北宋与南宋思想发展的各种“问题”之中。

最后，他还成功地将问题与两位对立者的具体生活阅历及人格联系起来。在这里，威严的朱熹不再作为一个无血无肉的“哲学家”或“圣人”出现，他被看作一位思想家，其独特的哲学热忱在一位 12 世纪中国卓越的思想家的全部焦虑和关怀——公众的与私人的——之中可以得见。另一方面，陈亮被描绘成一位特别具有攻击性性格的人，他远非某一固定观念的化身。我们看到，他是一位受过多方面影响的学者，其观点经常陷于矛盾之中，且随着时间的延展而改变。这里我们所见的不仅是中国思想，而且是“中国人思维的过程”。

本杰明·I·史华慈
Benjamin I. Schwartz

谢 辞

致谢是一种礼节，它并不能完全表达——远远不能回报——我在写作此书所得到的思想及其它方面的帮助。

我的老师本杰明·I·史华慈是我本科和研究生时期的指导老师，他耐心地给我以鼓励。熟悉他的“问题意识”取向的读者会从中看出他对我的影响。他给我以无数的亲切关怀，在此要感激的是他为本书写了序言。余英时是我的另一位导师，为我1976年的博士论文的终稿作了非常有价值的修改，并对我将之扩充为一本著作也提出了实质性的建议。我向二位导师对我多年在思想与个人发展上的关心表示感谢，同时还要向两位师母——Bunny 和 Monica，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她们总是非常地照顾我。

魏世德(John Timothy Wixted)对本书手稿给予有力的批评；而且，这位老友兼同事非常有耐心地按我的说法，逐字逐句地思考与本书相关的各种问题。Henry Rosemont, Jr. 给了我许多鼓励和很有见地的评论，尤其对那些可能招致哲学家反对的术语用法。刘子健教授细致阅读了本书手稿，改正了一些错误，特别是关于宋代历史与制度方面的错误。还要特别感谢杨

联陞教授、洪业教授和王德毅教授，他们为我检查了收有陈亮从未被研究过的论文的1212年版本，使我确信该版本的可靠。周芬娜(Kuan Chou Fen-nah)帮助我阅读了这一版本中的一些文章。我在写作博士论文，研究朱陈论辩时，陆惠风(Loh Wai-fong)校正了我对朱熹和陈亮书信的译文。Kent Guy以他那惯有的机智和博学回答了关于《四库全书》的问题。Herrlee G. Creel虽然自称是个外行，也对我的博士论文作了相当广泛、有益的评说。托玛斯·墨子刻教授就将论文改写成本书需要作出的扩充给了我颇有帮助的建议。其他阅读过论文并进行实质性评论的有Joseph Fletcher, Jr., Donald Munro, 杨联陞及John Schrecker。Florence Trefethen以她专业的编辑技巧对本书的前后统一作了处理。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同事们就多方面问题提出过建议，他们是Beth Luey, Roger Adelson, 麦金农(Steven Mackinnon)和Patricia Adank。另一位同事杜胡颀珍(Eugenia Tu)热心为手稿编写了词汇表和书目。承蒙历史系的Kathy Hansen, Shirley Moraga二位为我打印了终稿。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武爱华(Wu Aihwa)尽可能提供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帮助我获得研究所需的材料。如果没有哈佛—燕京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诚心合作，尤其是George Potter和Deborah White二位的帮助，我的研究将会更增不少困难。

国家人文基金会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为我提供的经济资助使我得以进行研究并完成本书的写作。国家人文基金会在1980年为我提供了暑期奖金，使我的终稿得以完成。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通过教员资助项目为我提供了暑期津贴，我还得到了人文学院院长研究奖金、研究生院1978—1979学年度院长研究资助。

我在此向成中英和柯雄文(Antonio S. Cua)二位先生惠允在本书第五章中运用发表在《中国哲学杂志》(5.4: 363—369, 1978年12月)上我的一篇论文中的资料表示感谢。这一资料已经过我